

望九琐忆

一位老者的 20 世纪



白永达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望九琐忆

白永达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望九琐忆 / 白永达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713-474-9

I. 望... II. 白...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505 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邀编辑 张 杰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9.25 印张 84 幅图 2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白永达，生于1920年，河北白洋淀人。中学在北京读书，后就读于金陵大学、西南联大，在战乱中颠沛流离。解放后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后任教于内蒙古包头师范专科学校。近年来时有回忆文章散见于国内报刊。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邀编辑 张 杰
装帧设计 王 芳

一段赠言

为友人白永达老弟所著忆往散文集《望九琐忆》题赠旧话一段，也藉此作为我与永达老弟之间的友情留个永恒的纪念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总处于历史震荡的变幻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吃文化饭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是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震荡中，以自己不同的生理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与形式的生命之路。因此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因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吃文化饭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动荡不宁的中国社会生活里，由于生活的责任感和实际的处世存身的需要，一般总富于生活的敏感与时代激情，处在生活的前沿地带。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兴亡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折射和反映，我们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人生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见之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贾植芳

2005年6月下旬上海

(注：此一段话原载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132—133页《忆尚丁》一文。——作者)

前言

在这里最先要说的，是感谢贾植芳教授。他以九十岁的高龄，冒着上海近年罕有的连续高温天气，为本书的写成与出版，题赠了他关于“吃文化饭”的知识分子有必要直面历史真实，写好个人生活回忆录的一段话。并且不顾年迈手抖的艰难，写来满满两张信纸的信，说是以此作为彼此友谊的永恒纪念。此情深切动人，话语句句说到了我的心上，也道破了个人写作时的区区私衷。实在是不以序文形式出现的序。这对于一个在八十五岁上才写完自己忆往散文集的人，是莫大的一种鼓舞与支持。所以，谨将他的这段赠言冠于书首，当做“前言的前言”，请读者先见为快。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可作为一个生活已久的人，难免对历史产生某些印象与看法。虽多半不过是感觉与常识性的判断，但感觉与常识有时却往往更逼近真实。中国自古有历代接续修史的传统，因此史籍浩瀚，史官文化发达，比之别国，有其优长之点。然而史官修史，每每也易于重官事、“大事”，而轻民事与“小事”。唯上是尚，以偏概全，不尽责道出历史的本义与本貌。从而更广泛地看，民间史料与“私人叙事”的存在，实颇重要。试看一幅《清明上河图》就在正史之外，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了宋代的生活。

20世纪是个动荡不已的世纪。时代动荡，人们也在动荡。动荡之中，发生在人的身上与心上的事就比较多了。写这本书，也是想从个人的角度观照一下这些事，作自我反思。并有两点希冀：一点是，由出生的1920年算起，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年即几乎一辈子，与它有些情分，但又

不太明白它。有些事半明半暗的，觉得须进一步研究。因而愿意向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敞开说说自己所经所见所做的一些往事，作为历史的“个案”素材，供大家检视和剖析。使其有点用处，以免白白湮灭。同时共同致力，从中澄清一些什么。当然，个人回忆难免有主观成分，但至少可以“过滤着”看。另一点是，作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情景下也曾活跃过的一个年轻人，即六十年前有些时代追求的“过气”老青年，愿和当今一代另有追求的新青年，交个前后时代间的老少朋友。聊聊天，过过话。说说我们年轻时有过的趣事、乐事、快事，和险事、难事、憾事，互相交流交流，比较比较。看看彼此间的观感与体验有何异同，行为指向偏重何方，为什么？对不对？另外还有什么时间虽异、但又会共同关心或面临的问题与苦恼？这样对照与印证一番，交换一下意见，也颇有味。有助于通心意，明脉络，和因应以后的时代。

为了方便，我在一生经历中，选取值得一记也大致可以说清的片段，写成一些单篇的散文杂记式文字。并在可能中配以图片，结集为一本自谓的回眸性散文集“图文书”。还应说明，我并不是个一生全程都“吃文化饭”的文化人。而只是一个从三十年前，即“文革”末期文化被“大破坏”得不成样子时，才被从“五七”干校另行分配到文化工作上的“半截子文化工作者”。虽然我对文化本有兴趣，而此后不久就“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文化又被看重并得到了相当的恢复、修补与发展。我也理所当然抱着“同病相怜”的心情，主动积极地投入了此项工作，并因原学经济而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加注意。可是如实看，“半路出家的和尚”毕竟底子薄，体味浅。难以如贾先生所期望，写出精湛深入、完整系统的回忆录。而只能这样像缝“百衲衣”一般，东掇西拾，零打碎敲着回眸。好比人家主力军打阵地战，我是“偏师”打游击。

说到写散文，乃是出于对散文的偏爱。可能自我高抬了。在学校读书时，既学经济，也爱好文学。曾与朋友们共组文艺学习团体，大量阅读中

外文学作品。我尤爱读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式的散文并学着写，还发表过几篇，如《边行散记》、《山歌》、《小蓝花》等。有的朋友如“七月派”诗人方然，还说过我有自己的风格。大概指写得较朴素吧？只是此后人事倥偬，一放五十年未写了，到七十多岁上为忆往才拾起笔来重操旧业，有个复习的过程。我的生活多变，往事较杂，不够纯一。好在时代在变，散文本身也在变，现今散文写作的路子与视野比以前宽泛，容量大了。余光中先生说散文的种类与内容有多样，正中下怀，我十分高兴。我要写的，主要是叙事兼抒情文，少数是说明与议论性的，也有些是夹叙夹议的，从90年代初开始，边写边改边想，十余年积稿约七十八万字。这次将它们剔抉、压缩、改写为三十余篇，将近二十万字。以免太多费读者们的宝贵时间。但常言说“敝帚自珍”，为了多“纪实”恐仍芜杂，不尽符合规格。请诸位读后不客气地给予批评指教。

我一生的生活，总的可分为三大段。解放前即二十九岁以前为一段：当时是“中华民国”时期，是我从幼年到青年不断在变化、成长的阶段。那时民族危机严重，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险，我早早卷入了政治。从十六岁起的十年间，为不当亡国奴与鲁迅所说的“自己人的奴隶”，前后加入了四次党派，思想上经历了由中间状态而右倾，又由右倾而左倾的转折。从“教会大学”毕业到解放前的四年多，从事过军事译员、中学教员、大学讲师、机关文员与下海为商种种职业。在民主运动中畅快过，在生活不安定中也屡受挫折。起伏转变多，这是第一大段。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是第二大段：职业上长期在国有银行当行员，精神状态上则较复杂。一面自认为是“革命的朋友”，愿热心为社会的进步努力工作，业务干得不错；另一面又不断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受怀疑，当对象，常处于命运难测的“敌我边缘”地带。在“反胡风”运动与“文革”中两次分别被关了各一年，失去自由。蹲过“牛棚”，住过也不太自由的“学习班”与“五七干校”。在“以体力劳动改造思想”中干过600℃高温的“化铝”作业，下过十一

层深的煤井。这是个曾满怀憧憬希望，又无法如愿与无可奈何的矛盾、困惑阶段。第三大段是改革开放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第二次解放，手脚开始放开，精神大为舒展。一心投入现代化，在六七十岁上成了我一生最为独立自主也干事最多的阶段。主要是主持一个高校图书馆和举办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十余年。同时兼办大、中等社会职业教育，担任一个市级“民盟”领导，以及业余从事写作。时间更长些。离休后仍久而不休，以忙为乐，并进行思索。

有个问题，在写作中时在揣摩：多年不写这种文字了，手已搁生，写后能否达意，有无人愿看呢？幸亏其间连续受到了激励。80年代末一位老友远道来访。四十年未见了，对方已成为海峡对岸一个众所熟知的专栏作家，出过不少集子，以后在大陆也出过几本。当初彼此相识与文学有点关系：一个学文学，一个爱好文学。而今学文学的已成了作家写过不少书，爱好文学的何不也试写一本以免愧对故人呢？于是两年后时间有了余裕就决意动笔，不成不休了。而写作中练笔，时有新作，需有适当园地。在这方面须郑重提到山东版“图文丛书”《老照片》的执行主编冯克力先生。《老照片》图文并茂，注重“私人叙事”与“温故知新”。和贾先生的赠言主旨一脉相通。他们每年出六辑，现已出到四十余辑。每辑印行几万册，读者稳定，很受欢迎。在长期操作中保存与发现，彰显了不少民间文化历史资料，可谓“素心人”办“有心事”。我从第三辑因先姊遗留的一张教会女子小学的文化资料照片和他们合作。前后发稿不下十次，彼此虽未谋面但已成老友与忘年之交。他与编辑张杰先生的不断支持与鼓励，增加了我持续写作的信心。

这本书，初拟名为《洪流微漩录》，流指时代，漩指个人生涯。意思是时代洪流巨大，然而它又是由一滴一滴的水汇集成的。中间的主流浩荡奔腾，其内与其旁也有一串串小涡漩时隐时现，共同前行。它们是互相关联的一体。这书我本为记述与反思自己，也记述经过的历史并进行反思，

说的是世纪与我的关系。——固然时间在前进，个人也在继续生活，有些事可能也牵连21世纪与其后。——但为免于太泛，出版时改为现名。

我明白，当今的读者，中青年为多，与我们一代人生活所处的阶段不同，时间差距较大，存在一定的代沟。当前主要是求发展的年代，与我们那时主要是争生存与自由有异。但作为人，和同是中国人，彼此又有同质与相互接近的一面。不可能完全认同，却可彼此了解，而且面对着共同的前景与问题。也许，你们会认为那时我们对集体的生存与自由太认真太专注了，不及其它。可是不生存不自由也谈不到发展。我们可能有偏颇和失误，但努力并未白费。时代不同，前后则相关，也有共同的利害。大家是历史长河中的先后旅伴，也是共利害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中国的现代化，要靠几代人的连续努力来完成。包括前人、我们、你们和你们的后一代、两代、三代。我国的改革有很大成果，也存在许多重要问题待决，大家都须有责任感，而主要是靠你们及后人。生活在中国，要对中国负责。生活在世界上要对世界负责，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医疗、教育的高收费使看病难上学难，与国际上恃强横行的“单边主义”，都是不负责任，难以成功和长久的短期行为，不可取。社会在转型，大家都在过渡与摸索，不够成熟。要在实践中成熟起来。20世纪动荡，21世纪也难平稳，要弄懂20世纪，过好21世纪。日子还长，路要走好。

愿大家一路平安！

目 录

- 贫而思变的下海人家 / 1
- 小学生看“北伐” / 6
- 父亲的趣味 / 10
- 八十年前白洋淀边的乡镇女子小学 / 18
- 从保定府到北平厂甸 / 22
- 我三次见到的蒋介石 / 31
- 老北京的名牌中学 / 37
- 西苑受训杂记 / 41
- “火花”一现的刘克忠 / 45
- 旧时学友 / 53
- 动心忍性在山城 / 58
- 洗牛塘上生死间 / 65
- “青春故土”华西坝 / 70
- 卜凯教授及其家 / 79
- 羌区步走三千里 / 87
- 左右不逢源的“现实文学会” / 103
- 我家的“战争殇” / 111

- 译员生活 / 118
-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的一次争辩 / 129
- 一段下海为商的经历 / 142
- 上海“朝明小组”与我 / 151
- “金女大”昔影 / 156
- 流浪中迎解放 / 161
- 青梅竹马——我负心的故事 / 166
- 时代的邂逅——幸福又不幸的“初欢” / 176
- 恋情化友情——一桩被海峡阻断了的婚姻 / 190
- 巧遇与晚成——姻缘不期而至 / 207
- 杭州一年 / 226
- 北京求职 / 232
- 下乡偶遇 / 238
- 难忘的1955年 / 249
- 幸免的“漏网之鱼” / 255
- 头肿大如斗 / 261
- “八不”生活 / 267
- 梦中行 / 273
- 河套“桃源”话干校 / 277
- 第二春：“思补更鸣” / 284

贫而思变的下海人家

1920年6月15日,我出生在当时的直隶(现在河北)省安新县新安镇小南街。新安镇位于白洋淀中部北岸,距北京约一百二十公里。历史上曾先后是涿城县与新安县的县城,有城墙和四个城门。城内在小南街三侧,还有东后湖与西后湖两个湖,实际是白洋淀的一部分。现在,新安镇又成了安新县的县城,不过城墙与城门都已经拆掉了。

到清末民初,即上一个“世纪之交”,家乡西面北面 and 东面的京汉、京奉、津浦各条铁路相继建成通车,新安镇作为京、津、保三角地带的水陆码头,地位下降。但代之而起的,是它又成了白洋淀苇业生产的中心。

白洋淀的港汊苇田连绵,苇业是一项大产业。所产的优质大苇适于编织,远近闻名。它除供编织民间生活所需的席、箔之用外,更重要的是与19世纪后期东北三省开禁放垦后崛起的大豆、高粱等大规模的商品性农业,以及渤海湾原就兴旺的“长芦盐场”紧密相关。商品农业与盐业生产上,需用大量的席、茭、包。引起冀东芦台一带的编席业大兴,所需的大批编织用苇,就靠白洋淀与相邻的东淀等水泊地区源源供应。于是商品性苇业生产随之欣欣向荣,成为热门产业。我家“荣利堂白”就是白洋淀区几十家苇业生产与经营大户中的一家。

我家祖上,本是镇上的穷读书人,历代靠开私塾、当塾师教几个学生为生。当塾师是个虽饿不死但也吃不太饱的职业。传到我祖父白鹤荣时,大概他认为应另谋出路,索性烧掉家中积存已久、很难赎的一堆“当票子”(典当衣物的赎回凭证),请人介绍到北京前门外一家山西人开设的“合兴



祖母、父母与三哥夫妇（1937年）

成参茸庄”，当了学徒。当学徒学买卖虽是镇上一般人家子弟的主要出路，但对于我家这样贫寒的“书香门第”，却是“下海”串“行”，改变“门风”，突破传统了。不过祖父很幸运，他这个“直隶省”籍的“打工仔”，居然在山西人占绝对优势的晋商店铺里，以能吃苦、动脑、肯干和有点文化，竟然通过一次次“三年说官话”（评成绩，定人事），逐步出类拔萃。由学徒——店伙——管事，最后升为“大掌柜”（总经理）。按例吃上了

股份，成为“人力股”股东，发了财。“荣利堂”就是他为我家起的“堂号”，意为将本求利得到荣发，用语与他的名字有关。他在旧式商号里显然是能者，在本店中成绩大、威信高。在家族中成了榜样，久久为兄弟子侄们所津津乐道与追念。他不但做大了北京的总店，还到江南的南昌府、九江府、吉安府等处开设了分号。在当时，参茸庄的主要消费者为高级官员。他为走动方便，还“捐”了一个五品官的虚衔，有官服。可他也不幸，1900年遇到“庚子事变”，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前后焚掠北京，他受惊致病，几年后去世，年仅五十多岁。二十多年后，我到北京（那时叫北平）上高中，

就被“合兴成”总店招待，长住在一间静室中，外间就是他的灵堂，供有其长生牌位。1937年暑假，我在家中的前北屋衣柜中发见了他那套“五品顶戴”的清代官服与红缨帽、黑缎靴。还偷偷穿戴起来，过了过“官瘾”。俨然就和当前电视连续剧中常见的前清官员一个样，只欠头顶不光，后脑秃秃没有长长的大发辮。

我父亲白志杰(号“峻忱”，是后由“俊臣”改成)，是祖父的独子。他一生既受惠于时代，又受害于时代。幼时家境好，上过九年私塾，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程度。本来他很向往上新式学校，而且无论上大学以及出国留学，家里都有财力，可惜未实现。祖父虽是成功的创业者，但究属旧式商人，认为致富了即已达到目的，父亲只要守住产业即可衣食无虞，因此不赞成他去上新学、干新事。父亲恪于“孝道”与独子的责任，只好放弃原想，留在家中。然而他有志待抒，并没有“坐吃现成”。趁白洋淀成为苇业中心之机，陆续用祖父发的财购置了苇田二百多亩，加上他表兄王恩普大伯所购的一百余亩地也委托他代管，共计四百多亩，成了又一个新的苇业生产与经营大户。

祖父逝后，父亲作为一个年方少艾的“财主秧子”本有可能被人引诱“耍废”。可他没有像一般传统富家子弟去“吃喝嫖赌吸”，而是一心一意，全力扑在苇业的学习与经管上。这既与当时的“维新”思想熏陶、祖父的榜样及自身有些知识和抱负有关，更具体地说，则与有祖母和母亲两位明理又有主见的女性从旁监督、辅佐，分不开。久而久之，竟成为白洋淀众多苇业大户中的后起之秀，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到抗日战争前，他四十多岁时被当地公推为镇长。所谓镇长，主要是名誉上的，因当时本镇为县属第二区驻地，上有区长管事。

经营苇业，主要是栽培皮白、柔韧、身腰好的优质“大苇”。春季要鬲泥施肥，夏季要拾蔓(拔去攀援性的蔓藤，以防苇株被牵连，遇风成片倒伏)除草去莠，秋冬要收割、晾晒、分级、打捆、上垛，最后垛成一个

个形如两三层中式起脊“人”字顶楼房的大苇垛。等待次年从天津、冀东、东北来的“老客”，签合同成垛购买。每垛几百捆，每捆时值银元(后为法币)二至三元，每垛约值千元上下。付款后，以内河“大槽子”木船(可载重五十至一百吨)运走。每逢主客双方在前院客厅洽谈交易，我与三哥这样尚未出外读中学的半大孩子便从旁侍应茶水。闲时则看父亲所写的“大苇”培植经验等文字，也算一种商业文化的“启蒙”吧！

由于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活路干，“荣利堂”白宅实际是一个农商企业实体。每年长期雇用农业工人几十人，加上短工可达百人左右，分班由几个“打头人”如赵葫芦大伯、曹春长叔叔、王二担子哥等人带领，分头在“大王淀”、“鸭圈淀”、“王家寨”、“郭里口”等处苇田干活。每天傍晚开工资，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帮忙端“铁板子”、数钱、记账。记账用的是毛边纸印的红直格布面旧式账簿。上记“收×××大洋×××元”，“支×××大洋(或铜元)×××元(或枚)”。这也是一种训练。而家中那位并不傻而是脾气较倔的远亲兼“大司务”的“傻大伯”张梦，则是父亲的助手和总管，他对外与几位领班共同规划、分派活路。众人称父亲“掌柜”，称傻大伯为“张管船”(他是船户出身)。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秋末冬初，上“苇铺”去玩是一桩乐事。所谓“苇铺”，就是集中晾晒、分组整理用船只或“冰床(即冰橇)”收割运回的大苇的作业场。场上有几间每年临时用杉篙、苇束与河泥搭建的茅屋，有火炕、炉、灶，用以做饭、烧水和住人。几十个农工在作业场上，身穿短棉衣，头戴狗皮帽，打绑腿，脚登东北“乌拉”式的生牛皮“楞靴”(防扎伤脚又防水)，雄赳赳的。他们打捆时是流水作业，一组几个人：抱苇的，拍齐的(用木制的沉重大拍板，将苇的根部拍齐)，轧捆的，上勒的，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配合得严丝合缝。尤其轧捆的一对工人给苇捆“束腰”时，把两条轧棒放准，发一声喊，纵身跳跃，将棒压于腰下，以全部体重为苇捆束紧了腰，动作剽悍而利落。此时上勒工人飞快地给苇捆上好“勒